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社会流动背景下农村用水秩序的演变

——基于安徽蒋村的个案研究

陈阿江,吴金芳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当前农田用水问题日益突显,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状况各不相同,微观层面的用水问题非常复杂。选取巢湖流域蒋村,对其近一个世纪农田用水进行微观分析。传统时期,以“塘口”为用水单位,通过“大户领小户”式的合作,遵循“点香计时”规范分水。人民公社时期,村庄拥有了水塘—水库—电管站三级抗旱系统,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又基本恢复了传统的塘口用水方式。近十年来,村庄人口持续外流,精英缺失,代耕者挑战“熟人社会”规范,人—地关系弱化,蒋村原有的用水组织和用水规范难以为继。村庄日益“空心化”使土地规模经营成为必然,土地规模经营将原来的户间合作用水转变为经营者的内部事务,有利于化解塘口用水问题,但要恢复村外的水库和电灌站用水,需要进一步优化产权和组织安排。

关键词:现代性;村落;水利;农田用水

中图分类号:C91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6-0033-08

一、导言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精神聚焦水利,彰显出国家对水利事业的重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度,水利历来受到重视;人民公社时期,为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及集体利用组织的力量,大兴农田水利,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用水条件。但随着农村社会现代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田水利逐渐被淡忘,原有水利工程的“红利”逐渐被消耗。无疑,宏观格局的水利问题,一号文件已阐述清楚,但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差异极大,微观层次的水利问题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关于农田用水问题,学界早有研究。如费孝通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时发现,灌溉是农民各管各家的,而排涝则需要集体协作。

万一有人不守约定,破坏用水秩序,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意思的是,开弦弓村的排涝组织是在村落之下家户之上的水利组织——农民以一“墩”水田为单元开展合作。^[1]这与本文案例村的灌溉组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却与近年来学界热议的“水利共同体”的组织特征有较大差异。这使我们注意到,需要什么样的组织,以及组织的实际运行,与地域状况、传统可能有密切关联。

近年来,学界热议的“水利共同体”是日本学者丰岛静英1956年提出来的。丰岛静英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水利社、地方社会组织的考察,指出地、夫、水之间形成有机统一是“水利共同体”的主要特征。^[2]随后,森田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水利共同体”这一概念。他指出,水利组织与地方基层组织密不可分,应从“国家—水利组织—村落”三方面认识和理解传统中国社会。^[3]受到水利共同体概念的启发,中国的一些社会史研究者,如行龙等提出“水利社会”这一概念,即“以水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社会关系体系”。显然,他们关注的重

收稿日期:2013-07-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村民环境行为与农村面源污染研究——基于太湖、巢湖流域若干村的经验研究”(12BSH021)

作者简介:陈阿江,男,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

吴金芳,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

点是“因水利而成的社会史”^[4]。

贺雪峰等对税费改革后农田用水组织问题有深入调查与悉心研究。基层组织弱化是税费改革后农田用水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利益与农业脱钩,地方政府治水积极性下降;取消共同共生产费、撤销村民小组又进一步导致基本灌溉单元村社的解体。^[5-6]基层组织的退出致使原子化的小农无法与大水利实现有效对接,出现“治理性干旱”^[7]。要走出农田用水困境,不能脱离小农经营的基本国情,强化国家及其基层代理人在水利供给中的组织者角色,方可解当前农田用水困境。^[8]

水权划分也是影响地方用水的一个重要因素。萧正洪等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水利产权问题。关中农村灌溉用水权属关系的最基本特点是所有权与使用权二者的分离,国家享有所有权,农民只享有使用权。^[9]张俊峰发现山西乡村社会中存在集体水权与私人水权共存的现象,二者并不矛盾,乡村社会对水权的界定与调整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安排。^[10]水资源产权的界定与区域地理、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社群关系等直接相关。^[11]实际上,中国社会的水资源产权是一种复合型态产权,国家、认知、信仰、仪式、伦理观念以及相应的庙宇祭祀等,影响和决定着水资源产权的系统和秩序,从单纯经济水权的角度,很难把握水资源产权的真谛。^[12]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在不断学习和借鉴世界其它地区的经验,试图通过市场化改革和组建用水协会等解决水资源产权不清晰状态。1995年,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的长江水资源项目在湖北漳河灌区成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农民用水协会。2000年,这种模式在全国主要大型灌区得到推广。^[13]总体上看,水利产权制度改革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为解决小农种田与“大锅”用水的矛盾提供了方向。^[14]

笔者认为,一个有效的用水组织是与当时当地的自然地理及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相适应的。因此,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去看基层是如何用水显得十分重要。基层水利设施是如何维护的?水是如何分配的?面临用水纠纷时,基层有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去解决、协调?现代性渗入农村后,用水方式又是如何演变的?本文以安徽皖中丘陵地区的蒋村为案例,就蒋村塘田系统的用水进行分析,探讨塘田系统用水组织的维持、演变及其对农田灌溉用水的影响,以及村落社会、文化对用水组织及其维持的

影响。

巢湖流域丘陵地区的农村,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修缮了较为完整的塘堰灌溉系统,形成了完善的用水组织及管理办法。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特别是近年来村庄日益“空心化”,对当地农田用水提出了诸多挑战。笔者等人于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先后3次对蒋村进行调查,主要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调查对象以熟悉村庄历史的老人为主,同时访谈了部分外出人员。2013年6月,笔者在巢湖流域的舒城县、肥西县、包河区及肥东县就农村问题进行调查,在理解区域宏观背景的基础上,再定位案例村的具体问题。

二、传统用水组织与规范

蒋村^①曾是典型的丘陵地区农耕村落。1949年蒋村共有14户,57人。村庄坐东朝西,背靠小山,面对梯田,如图1所示。整个村庄的面积约为600亩,沿山而下可以划分出四种类型的土地:一是山林,面积在300亩左右,主要生长着松树;山林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是水塘的“水塘”;二是坡地,面积约为100亩。坡地是耕牛的天然草场,村民还在坡地中开垦出10亩左右的旱地,主要种植棉花、红薯等;三是村民的宅基地和庭院等,占地约40亩;四是梯田和水塘,约180亩,其中梯田150亩左右,水塘30亩左右。水塘蓄水,为水稻种植提供灌溉水源。水塘插花分布山下,地势高于梯田,可以对水田进行自流灌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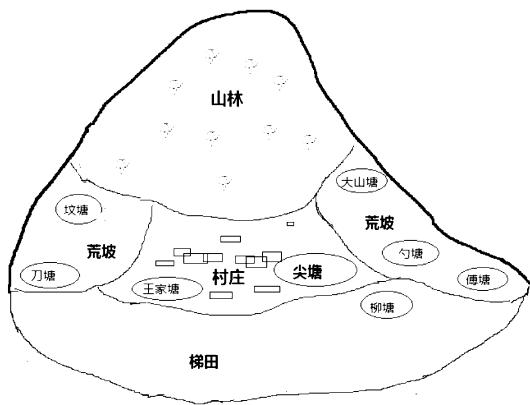


图1 蒋村地形示意图

水塘是蒋村最主要的水利灌溉设施。嘉庆

① 按照学术规范,对地名、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庐州府志·水利》记载了清巢湖丘陵地区的水利灌溉情况,“巢南多山,……陇坂之间,塘之大小杂然相望。以塘为灌,皆民力自润”。目前,蒋村共有八口水塘,灌溉水田160亩左右,其中本村150亩,外村10亩。

由水塘及其所灌溉的土地构成“水塘—水田系统”,可称之为“塘田系统”,简称为“塘田”。农户以“塘口”为单位共同用水^①。因土地的买卖或租赁,塘口内的用水户是变动的,用水户既可以是本村人,也可以是外村人。但水塘与水田是严格对应的,以保持塘口用水系统的稳定性。每一口水塘都下辖一定数量的“关系田”,塘口所辖的“关系田”是固定不变的。水田买卖过程中,遵循“水随田走”的原则,农户在购买水田时,相应获得了附着在水田上的水塘股份。每一塘口都有一个“领头大户”,他负责出面组织塘口修理和水源分配,塘口内的其他农户在“领头大户”的带领下,根据各户拥有水塘股份的大小参与塘口的修缮与维护,并获得相应份额灌溉用水。塘口产权较为清晰^②,有明确的责任人和自己的用水规范,规约“关系户”实际用水行为。下面以村中最大的水塘“尖塘”为例说明。

尖塘是蒋村最大的水塘。尖塘有“关系田”43亩,“关系户”八户。村中“地主”王某股份最大,一户占20亩,其他23亩归七户共有。尖塘的修理与水源分配事务均只在这八户内进行。

“大户领小户”是尖塘用水的基本组织形式。大户王某充当“领头人”,牵头统领塘口内的其他小户。小户则依据自身水股大小,以户为单位参与到大户组织的水利事务中。大户王某是尖塘的总调度师和纠纷调解者。他有权决定水塘是否需要修理以及何时修理。如需修理,则由他出面召集各关系户“碰头”。估算用工量,折算出每户出工量。开工前,王某则要到村口的土地庙里求签问佛,选定“黄道吉日”开工。开工后他负责记录每户出工量,保证不出现漏工。当工程较大时,他还要向塘口内的“关系户”收取少量现金,用于开工前的“动工饭”。有时他也会出资请大家吃免费“动工饭”。决定和协调塘口水源分配是王某的第二项重要职责。他有权决定何时开塘放水以及每亩田放多少水。他还要负责协调人员分工,安排守香员和车水劳力等。王某是用水纠纷的主要调节者。虽然有点香计时的分水规则,但不能保证每个农户都会遵守,用水高峰时,时不时出现用水纠纷。一旦发生

纠纷,他便充当纠纷的调节者。

小户参与塘口水利事务过程中表现出两面性:依存与对立。一般情况下,普通小户在水利事务中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大户不领头,分散的小户难以实现合作修缮水塘;分水时,没有大户的出面组织,也会混乱不堪。所以只要大户做到相对公正,小户都会采取积极配合的姿态。但是大户难免有“徇私舞弊”的行为,这时小户就会表现出“对立”的一面。当大户行为出现明显偏差时,小户会联合起来向他施压,轻者通过制造“舆论”给他施加压力;问题严重时,小户们也会联合采取集体对抗行动。1935年,蒋村所在地区出现大旱,大户王某偷偷给自己多放了两亩水。第二天,同一塘口内的其他小户发现后非常气愤,他们扛着铁锹去铲王某的田埂。王某自知理亏,只得自认倒霉。

大户与小户在塘口内组织合作是一种典型的“互惠性生存”^[15]。水利设施的良好运转,可以使大户、小户共同受益,反之则共同受损,利益的共同性将双方紧密联结起来。小户依赖大户的组织权威。大户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本,享有较高的社会权威,具备实现权威性领导的社会条件,他们很容易对塘口内的其他小户施加社会影响。“只有大户能管好水,他说话没人敢不听!”大户在经济上也依赖于小户的配合,“水要是管不好,大户的损失最大。”双方只有通过互惠合作,才能实现有限水源的高效利用。

“点香分水”是塘口分水的基本规范。尖塘放水时,大户王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亩水田的灌溉时间,并燃香计时。同时在塘口内选出两三个被认为是较为公正的人担任守香员,轮流值班。轮到每户放水时,要点上一定长度的香。为防止风和雨等天气因素影响^③,一般点上香以后,要立即用一个特制的瓦盆将燃烧的香扣起来,瓦盆上留有一气孔,以便空气流通。守香者要不时观察香的长度,香燃尽时,就停止给该户放水。安排下一户放水,

① 在当地农民的话语中,“塘口”既指水塘的放水口,也指以某一口水塘为边界的用水单元,如某一水塘有多少关系户,多少关系田。

② 这里的“产权”更是一种实质论经济视角下的“复合产权”,产权是人们在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力和义务,它与资本主义伴生物的私有产权制度有实质性区别。参见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4):23-50。

③ 在露天环境下,风大时香的燃烧速度要比无风时快,该农户的放水的时间自然会相应缩短。偶然遇到下雨天,雨会浇灭燃烧的香,正常的放水秩序也会受到影响。

重新点香,依次进行。每户根据自己水田面积的大小,获得相应份额的灌溉水。整个放水过程有条不紊,避免了农户之间的相互扯皮。

如果说“点香分水”规范是农户之间合理分水的基础,那么“守香员”的公正、尽责守香是“点香分水”规范实施的前提条件。但“守香员”也是人,也有人情关系、利益考量,“守香员”如何才能公正、尽责地守香呢?首先,“守香员”的挑选是十分慎重的,在塘口内由各户公推产生。担任守香员的人要具有以下品质:“有公心”“有良心”“厚道”。其次,如果“守香员”违规,不仅要面临周围舆论谴责,丢失“守香员”的职位,同时也把“面子”给丢了。传统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相互熟识、信息公开透明、相互监督的社会。村民都清楚,“不管是哪个管水,背后都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

人民公社以后,以塘口为单位的用水方式发生了改变,村庄农田用水被高度组织化。当时为了提高丘陵地区的抗旱能力,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被修建起来。蒋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建成了一套三级抗旱保障体系:水塘—水库—电力灌溉系统。人民公社时期,蒋村变成一个生产队,村庄土地归集体所有。水塘、水库和电力灌溉系统归集体所有,由不同层级的集体组织负责修建和使用。水塘是第一道抗旱保障。八口水塘由生产队长统一放水,无需遵守塘口与“关系田”对应关系;修塘时队长根据需要派工,生产队记工分。水塘提供的灌溉用水约占用水总量的60%。公社修建的水库构成第二道抗旱保障。当旱情严重,水塘无法满足水田灌溉需要时,公社统一调度,蒋村和其他一些需要水的生产队一起从4公里外的水库引水灌溉。水库提供的灌溉用水约占总用水的30%。由若干公社联合建设的电力提灌系统是第三级抗旱保障,当水库灌溉仍然不足以应付旱情时,就通过电灌站从巢湖取水。三级抗旱确保村庄的水田无旱之忧。人民公社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国家强调“以粮为纲”,使农业“命脉”的水利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同时,土地集体所有集体使用与强大而完善的组织体系,使需要合作的水利成为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三、用水失序现象的产生及其原因分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水库和电灌站

这类大中型水利工程与土地承包到户的经营体制很快出现问题。产权不清晰导致水利设施投入和维护主体不明确,农田水利建设开始“吃老本”,加上使用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作为第二、第三级抗旱保障体系的水库和电灌站运转出现困难,使用次数逐渐减少,2000年以后村外水库和电灌站就被弃用。

以塘口为用水单元的传统在“分田到户”后得到恢复传承。农户自发重建水田与塘口的一一对应关系,依据农户水田的多寡重新划分塘口内各户水股大小,农户依据自己水股的大小出力修塘,获得灌溉用水等,推选村民小组长充当塘口“领头人”,组织农户集体用水。恢复塘口用水单元实际上是农户的一种非正式化的私有化策略,塘口用水产权相对清晰,塘口建设维护与管理有明确的责任人,能够保证用水的可持续性。1998年,针对人民公社以后村内水塘失修的情况。村民以塘口为单位,根据塘口内各户水股大小,自发集资对村内两口最大的水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

近年来,蒋村人口不断外流,传统的塘口用水组织和用水规范难以为继,村落用水失序。本来水塘每年都要利用冬闲时间进行维修,但目前村民对水塘的维修没有积极性。目前,村内八口水塘都面临不同程度淤塞。六口水塘严重淤塞,这六口水塘自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从未得到有效修缮,直到1998年才彻底修缮了两口水塘。通常认为,资金是农田水利维护的最大的障碍,但现实中的情况显得比较复杂。2011年,蒋村所在的行政村从镇政府获得两个“免费修当家塘”的指标。行政村将一个指标分给蒋村时,蒋村村民却不要指标。修塘无人问津,分水时农户却争先恐后。过去是村民小组长统一放水,并且严格遵守塘与水田的对应关系。现在无人负责放水,并且塘与水田对应关系也被打乱。谁要用水,谁就开塘放水。想从哪个塘放,就从哪个塘放。一到用水高峰,混乱不堪。“谁抢得厉害,谁分的水多”。往往是天露微旱,塘里的水就被用光,旱情严重时,反而无水可用。为何一个有着良好用水传统的村庄,现在却面临如此困境?

人口外流使蒋村日益“空心化”态势明显。蒋村的人口外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单身青年进城务工;90年代中期之后,已婚人群加入到打工队伍中来;2000年以后,村民热衷于在城镇买房,外出定居的趋势逐渐明朗。最近几年,蒋村人迁入城镇的速度加快。据统计,2000年7月,蒋村户籍人口为148人,到

2012 年 7 月,户籍人口下降到 56 人,实际留下来 常住的只有 24 人,且主要是中年人和老年人。

表 1 2012 年蒋村常住人口

户序	姓名代码	性别	年龄	职业状况	备注
1	WSC	男	70	约种 10 亩田	子女全部移居城镇
	MFL	女	65		
2	JGY	男	80	约种 2 亩田	子女全部移居城镇
	FX Y	女	79		
3	WXF	女	49	不务农	丈夫和子女都在城市,主要是照顾娘家患病的母亲
4	WS	女	85	不务农	其分居的儿子 XMF 留村务农
5	XMF	男	64	约种 10 亩田	子女全部移居城镇
	CCF	女	64		
6	WSD	男	71	约种 5 亩田	子女全部移居城镇
	YC	女	73		
7	WSY	男	83	仅种少量旱地	其分居的儿子 WCJ 留村务农
	FX X	女	84		
8	WCJ	男	55	约种 20 亩田,兼养鱼、开拖拉机	子女都在城镇 智障。
	XQ	女	53		
9	LGZ	女	76	不务农	女儿全部出嫁,没有儿子
10	JGM	男	57	不务农	有疾患,单身
11	WSC	男	54	约种 20 亩田	子女都在城镇
	YQ	女	54		
12	WCL	男	57	约种 20 亩田,兼养羊、开收割机	子女都在城镇
	DGL	女	54		
13	LYS	男	41	约种 15 亩田,兼瓦工、开收割机及 拖拉机	子女未成年,在家读书
	XGH	女	33		
	LQ	女	17		
	LXX	女	13		
合计	24 人,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13 人。				

伴随人口外流,农村青壮年劳力外流,特别是农业精英缺失,造成了村庄的用水困境。在蒋村,传统的农业生产精英老化,新生代精英或外流,或对农田用水外行,导致“塘口”领头人缺失。2005 年以前,蒋村村民小组长(管水员)一直由一位吴姓老农担任,他对水利事务的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继承,2005 年他因年迈辞去职务。村庄亟需要推选出一位年轻人接任村民小组长一职,但村中留守的几位中年男性都不适合承担这一职务。村民形容留下来的有三类人,“老的、没用的、坏的”,村里协商很长时间都没有选出合适人选,于是大家最后决定让留守的中年男性抓阄轮流担任。

农业精英缺失弱化了农户在水利上的合作。长期以来,村落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利“专业人员”的延续机制。1949 年以前,村中“大户”是水利管理精英,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一

把锹放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期,村民小组长组织农户集体用水。但随着精英的流失,公共事务缺乏组织者,各个家庭各自为核心,犹如“一盘散沙”,集体行动也就难以达成。

人口大量外流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外村人代耕蒋村的土地。2012 年 7 月,蒋村有近四分之一的水田由外村人代耕。外村人的用水行为打乱塘口内原本相对清晰的产权对应关系。外村人只是暂时获得水塘的使用权,水塘的股份仍归地主所有,加上代耕的不稳定,“种一年是一年”,他们无法获得水利投入的长期回报。因此,外村人不愿参与水塘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更不愿参加定期的水利修缮。用水时,代耕者不熟悉水塘实际产权划分情况,他们不遵守按照田与塘口的对应这一基本原则,采取“就近原则”,田离那口水塘近,就从那口水塘放水。

“外人”身份也为村外代耕者逃避规范约束提

供了方便。村落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用水规范,但是这些“熟人社会”产生的规则对村外陌生的代耕者难以产生有效的约束。实际分水时,他们有时假装不清楚蒋村的用水规范,故意违规用水,有时他们还会故意从别人刚刚施肥不久的水田“过水”^①。外村人之所以屡屡违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在村中居住,与原住民民间社会联系少,无需面对村民的舆论压力,“熟人社会”的面子、道德约束机制难以奏效。

外人违规对本村人产生不良示范效应。外村人不遵守村落用水规范,不仅侵犯了本村人的实际利益,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用水秩序。在用水秩序遭到破坏又没有进行有效干预的情况下,本村人也开始纷纷仿效,加入到违规用水的行列中来。本村人不再遵守塘口统一放水的规则,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开塘放水,村庄水源分配变的无规可循。在水利的维修方面,外村人不参与水塘维护的行为也挫伤了本村人管理水塘的积极性。2010年春,一个多月的连阴雨,村中最大水塘出现决口。由于下雨,加上气温低,中年男性村民都不愿意去堵决口。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显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外人”身上是不合适的。因为假设蒋村本身的用水秩序坚不可摧,外人就不大可能普遍的越轨;相反,越轨行为可被既有的秩序所框正。

所以,人一地关系弱化是村庄用水困境的基本社会背景。费孝通曾用 Earth-bound 来形容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可见中国传统社中人地关系是如何强大^[16],但今天蒋村的情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7月,蒋村有19个家庭在城镇买房,67人迁至城镇。另有九户,32人(其中一户已在城镇买房,户口暂未迁出)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已经基本脱离农业生产。留守在村中的农民,共有十三户,24人。这类农户主要是兼业户,以及依靠土地养老的老年户。他们虽生活在农村,但是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已降低。可见,人一地关系弱化,不仅表现在居民对土地、对农业的依赖减弱了,在空间上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乡村,而且在心理上、观念上,特别是从小在城镇长大的年轻人,对土地对乡村的依恋降到了“冰点”。

四、结论与余论

以上主要讨论了蒋村过去与当前的用水情

况^②。传统时期,塘田系统与用水的制度安排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体系。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强政府强组织及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用水组织作为农业生产组织的组成部分,农田用水得到了组织保障。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是恢复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用水传统,但随着人口外流、现代性的渗入,进入新世纪以后用水问题日益突出。

人口外流致使村庄“空心化”,这是一种有形的变化;但实际上,存在另一种反向的流动,即“现代性”因素向村庄的渗入。中国最近30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对每一个农村社区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更何况像蒋村这样的“空心村”呢?蒋村的大量劳动力在外地就业,家庭迁居城市,相应地反馈很多信息,影响着在村居民。按照韦伯的看法,现代性的根源在于理性化,而理性化最重要方面,就是深思熟虑地根据自我利益适应局面,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古老习俗^[17]。对日益理性化的农民而言,农业仅仅是不那么有利可图的“生意”了,所以潜意识中没有必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维持传统。像过去行之有效“点香计时”办法,其实施和维持是需要成本的。对村民而言,与其去“点香守水”,还不如去打打零工挣现钱。是否参与水塘的维修,村民也更多地从经济的投入—回报去考量。水利兴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老年人和外村人因耕种年限短,无法享受长期回报而不愿兴修水利,中年人因农业经济效益低,偏爱在非农领域投入。加上水稻生产技术的提高,比如化肥的使用,耕作方式的改变等等,虽然用水不那么井然有序,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也有限,即使对水稻产量有所降低,对村民家庭经济的影响也十分有限。理性化也使传统的约束力不再那么有效力。以往,如出现违规用水时,他人的议论、述说及当事人的“面子”会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传统村落用水规范产生并发挥作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即传统村落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信息共

① 蒋村田间灌溉并无专门的水渠,所以农户灌溉自己的水田时,必须从别人水田中“过水”。当农户需要从别人水田“过水”时,一般都要事先与田主“打声招呼。”这种口头通知有两个好处:一是田主会事先留意一下自己农田原有储水量,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别人“过水”时借机多放自己的水。二是,避开施肥等特殊时期。如果某户刚给稻田施肥不久,这时候从田中“过水”,肥料会随着水流而流失。

② 需要说明的是,蒋村案例有一定的特殊性,蒋村的人口外流比较突出,村庄空心化特征明显;蒋村农田用水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进入新世纪以后,村庄基本放弃使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第二、第三道抗旱保障系统,退守到村内传统水塘用水,这在其它农村地区可能也不多见。

享的熟人社会。在日益空心化的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农村社会变得日益开放和不稳定,传统用水方式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会受到更大冲击。

未来,城市化水平仍将不断提高,某些地区村落“空心化”也将进一步加剧。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50%,2012年达到52.6%^①。就蒋村一带的农村看,大量人口流出乡村进入城市,估计十年后会有相当一部分自然村落因无人居住而消失。以蒋村为例,2012年7月,蒋村户籍人口从十年前的150人左右减少到56人,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目前实际常住的只有24人,仅占原本意义上村民数的六分之一还不到。留守村庄的24人中,60岁及以上老人12人,占一半,且其子女均已定居城市(见表1)。由于大量人口外迁,地方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相应也滞后了,比如教育,因为学生少,乡村学校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社会服务的滞后反过来更加剧人口的外流。按目前的发展趋势,十年后从事农业的60岁及以上老人绝大部分人将退出农业生产。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年家户有三户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55岁,十年后他们也难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如果纯粹从用水角度看,很容易得出悲观的结论,进而提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民用水组织建设等建议。但如果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去看,无论是回到传统时代,还是回到承包制初期的小规模经营,像蒋村这样的“空心村”已不可能。土地规模经营将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四十来户曾四季劳作的250亩土地(150亩水田、100亩旱地),若干年后就只有两三户甚至只有一个家庭农场在经营了^②。土地规模经营,有助于解决蒋村的塘口用水问题。道理很简单,以前是若干户合用一个水塘,所以必须有户与户的用水合作;而规模经营以后,塘—田系统在经营者的范围之内,用水变为一个纯粹的内部事务,户与户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要恢复水库和电灌站用水,则要结合地方农田经营方式变化、水利工程特点、地方文化安排等,做好这类水利设施的产权改革,明确水利设施对应的责任人,在此基础上探寻相配套的建设和管理模式,做到物尽其用。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2-153.

- [2] 钞晓鸿. 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6(4):190-204.
- [3] 森田明. 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23.
- [4] 王铭铭. “水利社会”的类型[J]. 读书,2004(1):18-23.
- [5] 罗兴佐,贺雪峰. 乡村水利的组织基础[J]. 学海,2003(6):38-44.
- [6] 田先红,陈玲. 农田水利的三种模式比较及启示——以湖北省荆门市新贺泵站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15.
- [7] 李宽. 治理性干旱——对江汉平原农田水利的审视与反思[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62-170.
- [8] 贺雪峰,郭亮. 农田水利的利益主体及其成本收益分析——以湖北沙洋县农田水利调查为基础[J]. 管理世界,2010(7):86-97.
- [9] 萧正洪. 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48-64.
- [10] 张俊峰. 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35-45.
- [11] 赵世瑜. 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2005(2):198-203.
- [12] 张小军. 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7(4):23-50.
- [13] 王金霞,黄季,Scott Rozelle. 激励机制、农民参与和节水效应:黄河流域灌区水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4(11):8-13.
- [14] 张嘉涛. 对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反思[J]. 中国水利,2012(14):35-38.
- [15] 杨善华.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8.
- [16] Hsiao-Tung F, Chih C I.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17] 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 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1.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蒋村旱地耕种面积波动较大。传统时期,全村只有大约10旱地。人民公社初期,村民开荒开到山顶,旱地面积300多亩,后因水土流失严重,旱地面积缩减到60亩左右。1980年代以后,旱地面积又有所增加,此后维持在100亩左右。

Evolution of Rural Irrigation Order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Jiang Village in Anhui Province

CHEN Ajiang, WU Jinf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Recent years witnessed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problems. Becaus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are different in various regions, micro-agricultural irrigation problem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 paper selected Jiang Village in Chaohu Lake Basin as the subject of our case study and analyzed microcosmically its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cross nearly a century. Farmers took the basin mouth as water unit,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in a way of large households leading small households and following the norm of allocating water by incense timing in the Traditional Period. Jiang Village had a 3 level drought resistant system in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pool, reservoir and electric power irrigation sta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farmers restored the traditional irrigation way of pond mouth. In recent decades, village population flowed out and so did the leading households. As a consequence, the outsiders who cultivated Jiang Village lands on the basis of rental deal challenged the acquaintances society norms and the people-land bond weakened. The original irrigation organization and norms were difficult to sustain in Jiang Village. In the increasingly hollowing village, land scale management became inevitable, which would change the original co-operation between households into operators' internal affairs, which would help dissolve the irrigation problems in pond mouth unit. But if we want to restore the use of reservoir and electric power irrigation station outside the village, we nee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arrangement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orga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ty; Village; Water Conservancy;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上接第 32 页)

place by market-orientation and the conduction of innovative awareness. Farmers' learning ability indirectly affects th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to be specific, the stronger the farmers' learning ability,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market orientation and the stronger the innovation spirit,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Each additional unit of farmers' learning ability may eventually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 by 20.48%. When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the farmers' market-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wha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s improving farmers' learning ability by providing some guidance on consumer demand, market prices, and new varieties and technologies and other in-service information or skills training and upgrading their produc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market-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Farmer; Learning Ability; Market-orientation; Innovative Spirit; Production Performance